

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方法论刍议

任志锋

(东北师范大学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方法论拥有独特的理论立场、问题界限和方法范式。在理论立场上,重在超越“自我参照”与“他者参照”两极对立,坚持“以我为主、他者为镜、人我互动”。在问题界限上,重在通过“简化——综合”与“表层——深层”,划定文化边界,区分文化层次。在方法范式上,重在批判借鉴“跨文化比较论”与“跨文化互动论”,克服参照系选择、文化相对主义取向等弊端,妥善解决“因果关系与对等性”的难题。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 理论立场 问题界限 方法范式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707(2016)2-0018-05

近年来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国际视野与比较研究的兴起,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关注。一些学者的探索研究蕴含着这样一个共识: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选择。从这个共识出发,我们进一步思索这样的问题:什么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才能助力中国问题的破解和普遍规律的把握?解决这个问题离不开方法论意义上的探索,因为跨文化研究实质上就是一种方法或理念,它在运用于不同学科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兼具跨学科色彩与不同学科特质的方法论群落,正是这些相互关联又彼此独立的方法论推动了跨文化研究的发展。为此,从方法论角度探讨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整体理解。

一、自我与他者: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理论立场

跨文化研究是伴随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产生的,所以在它产生之初就有着以西方为中心抵制“狭隘民族主义”、推动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普世化的价值诉求,并以此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殖民主义跨文化研究传统。这种传统有三种典型的方法论特征:一是简单的两分法,即“以自我为参照”,将世界文化划分为西方与东方、文明与野蛮、现代与传统、进步与落后、民主与专制、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将前者序列视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所独有,用后者序列指代世界其他文化,这两种序列的逻辑关系是前者序列优越于后者序列、后者序列从属于前者序列。二是必然的历史观,即将后者序列向前者序列发展演进视为历史的必然,将前者序列对后者序列的改造当作历史的正当性。三是差异的问题取向,即从各种文化现象中寻求前者序列与后者序列的差异性,并将这种差异视为负面的理应被改造的因素,然后再将之归因于后者序列的地理环境或文化品格。

这种殖民主义传统影响深远,不仅给西方跨文化研究打上了霸权主义烙印,也使“第三世界”的跨文化研究形成了深刻的自卑情结和强烈的反抗情绪。从自卑情结来看,由于西方文化的先发优势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长期学习和对自身文化的深刻反省,“第三世界”跨文化研究者曾一度认同了殖民主义的文化判断,其结果就是“以他者为参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项目编号:15JDSZ201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经费专项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xq15013)阶段成果

照”检讨甚至贬低自我。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每当自卑情结兴起之时文化保守主义便迅速回潮,集中表现就是我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一再上演的“全盘西化”与“文化复古”之争。从反抗情绪来看,“第三世界”对殖民主义跨文化研究传统的整体性反抗是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殖民体系瓦解产生的,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以萨义德的《东方学》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萨义德揭示了西方话语中的“东方形象”的虚假性,指出东西方之分是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人为建构,“东方与其说是一个地域空间,还不如说是一个在话语中被反复谈论的对象和特征。”^[1]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于唤醒“第三世界”的文化自主意识、抵制自我文化在他者话语中的妖魔化有一定意义。但其“自我参照”的理论立场也可能导致“文化部落主义”,加剧不同文化间的对抗和冲突。直至近些年,伴随经济全球化与文化间交融、交锋、交汇的发展,跨文化研究领域对先前这种“自我——他者”两极对立式的理论立场进行了反思和超越,倡导文化平等、文明对话正愈发成为主流。伽达默尔的视域融合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等先后涌入跨文化研究领域并成为主导性的方法论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就是在这种大的理论立场转换背景下提出的。我们显然不能重蹈“自我参照”和“他者参照”的老路,那样只会陷入文化殖民主义的怪圈或文化部落主义的泥潭。那是否可以简单采取视域融合、对话交往的理论立场呢?恐怕也不尽然。一方面,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两大价值观体系更趋艰巨化、复杂化、隐蔽化的斗争现实,警示我们不能放弃自我参照的理论自觉,一厢情愿地与他者对话;同时意识形态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属性使我们必然与他者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往往不是话语、理念上的分歧,而是国家利益、政治制度、发展道路上的不同,不会通过表层性的话语创新、差异尊重、有限自信就可以消除。这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需要首先考虑的立场问题。另一方面,中外经济紧密对接与思想文化交融、交锋、交汇的时代背景,以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国家战略,又使文化的交流对话成为必然,闭门造车、固步自封当然也不可取。

在此情况下,“以我为主、他者为镜、人我互动”或许是我们的最优选择。“以我为主”就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为根基,敞开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视野,探寻可为我所用的他者文化资源以做强自己,把握跨文化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规律以服务中华文化走出去和提升中国理论的国际话语权。“他者为镜”就是将跨文化研究置身他者文化语境之中,把握他者文化传统与文化战略的思想政治教育实现规律,批判借鉴他者既有经验和成功做法,观照自己、发展自己。“人我互动”就是在以我为主的前提下,聚焦当今世界面临的“生存性焦虑、选择性困惑、信仰性缺失”等共通性思想难题^[2],把握不同思想文化影响中的问题样态,寻求他者与我可资对接的思想文化管道,在交流对话中形成破解问题的“中国方案”。

做到“以我为主、他者为镜、人我互动”,从方法论上还需要明确这样两个问题:一是保持意识形态自省。既要有高度的意识形态自觉,也应防止过度的意识形态敏感。前者之关键在于保持理论定力,防止在他者的镜像中迷失自己,使跨文化研究的过程变成他者的“理论旅行”。后者之关键在于保持理论自信,防止草木皆兵、畏手畏脚、自我设限,最终只有跨文化之名而无跨文化之实。二是适当的他者视域。强调“以我为主”绝非是完全以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附会他者,那样只会遮蔽他者真实的镜像。相反,而应该借鉴巴赫金的“外位性理论”,用他者的逻辑透视他者的思想政治教育,毕竟“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文化的眼中才能较为充分和深刻地揭示自己。”^[3]质言之,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要有定力不要有惰性,要有主见不要有偏见,要同情地理解他者选择,自觉地鉴别他者经验,科学地与他者对话交流,从而实现“以我为主、以人度人、人我互动”。

二、边界与层次: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问题界限

如果说“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是区分不同科学研究的标准^[4],那么如何把握这一矛盾性的外延边界、层次构成亦即科学研究的

问题界限,则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责任。对于以不同文化间观念行为的异同及其相互联系为“特殊矛盾”的跨文化研究来说,其问题界限与文化边界、文化层次紧密相关。文化边界指涉的是文化的分类标准,即“跨”的对象怎么划分?文化层次指涉的是研究对象的问题选择,即“跨”过之后研究什么?从文化边界来看,理论界常见的划分标准有很多,如地域标准、人类活动标准、历史年代标准、宗教标准、形态标准,这些标准或基于学科视角或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纷繁复杂,不一而足。其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标准混淆或相互替代。如美国学者纳西夫就指出,许多跨文化研究者“所用的‘文化’一词可以同国家、民族、社会等词对换”^[9],这就使跨文化研究变成了跨国研究。从文化层次来看,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研究对象的随意性与研究成果的浅显化,仿佛只要涉及异质文化现象都属于“跨文化研究”。事实上,跨文化研究之所以是其自身不在于是否研究文化,而在于用独特的方法论研究文化,即研究文化的世界性流动以及在这一流动中对不同文化产生的影响。它不仅需要国家性的立场更需要全球性的视野;不仅需要个别性的案例更需要大样本的搜集;不仅需要表象性的描述更需要深层次的探究。正因为此,荷兰社会学家霍夫斯塔德才主张跨文化研究需要世界性的研究队伍,需要结合不同国家的理论形成理论框架,纳西夫才强调样本的代表性、测试手段的文化差异、横断面数据的片面性等是跨文化研究方法论难题。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也将面临上述难题。破解这两个问题,我们可以吸收借鉴其他学科的经验,做出如下尝试。

尝试之一:用“简化——综合”策略解决文化边界的划分问题。尽管在多元文化、后殖民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语境中,简化法备受争议,因为它可能会导致对个别文化的忽视和矮化。但是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来说,这或许不失为一种选择。因为我们不像人类学和全球史那样对世界文化进行全方位的细致研究,也不像殖民主义传统那样对多元文化进行等级划分,而是侧重关注那些与我们联系较为紧密、影响较大的文化类型。换言之,我们是一种基本性而非全息性的跨文化研究,如果是这样,简化法显然适用于我们。事实上,

国外已有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如德国学者卜松山就运用这种方法探讨了中西方跨文化对话中的价值问题。他说:“我仍然认为,如果要进行基本的比较,简化仍然是很有用的方法,尽管不是必不可少的方法。”^[10]运用简化法,我们首先可以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划定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边界。在宏观上,以核心性的意识形态原则为标准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类型;在中观上,以不同国家或区域意识形态传统和现状为标准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内部的思想政治教育类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可以区分出民主社会主义(西北欧)、国家资本主义(法国)、自由依附资本主义(中东欧)、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英美等国)等思想政治教育类型;在微观上,以同一国家不同意识形态主张为标准把握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以美国为例,可以探讨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在美国道德教育、品格教育、公民教育中的具体表现。同时,也可以以世界不同区域的长时段历史演化为标准,划定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边界。例如,可以探讨中国文化、日本文化、伊斯兰文化、欧洲文化、英美文化之间思想政治教育的异同。另外,在采用简化法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时,还应注意综合运用多种文化划分标准来透视某一文化语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就是所谓的综合法。例如,我们研究美国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应综合考虑新教徒精神与清教徒精神的本义和演变(宗教标准)、后工业文化(人类活动标准)、后物质主义文化(形态标准)等各种文化样态的影响,避免以偏概全,片面凸显某一种文化的决定作用。

尝试之二:用“表层——深层”策略解决文化层次的划分问题。将文化区分为表层和深层的方法广泛存在于许多跨文化研究理论之中,例如“文化冰山模式理论”、“文化维度理论”(霍夫斯塔德)、“文化身份理论”(查尔斯·泰勒)等等。借鉴这些文化层次划分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在表层文化上可以探讨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教育体制、文化政策、意识形态战略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相互联系;在深层文化上可以探讨不同文化共同体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

结构、政治传统、哲学思想、伦理惯习、时空观念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的相互联系。如果将这两个层次的问题按照研究的先后顺序做个区分,表层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需要首先关注的,对它的研究将直接影响对深层问题的理解和把握。这方面的研究一般可以采取文献搜集、田野调查、实地生活等方法。但是我们不能满足和停留于此,还应进一步探寻深层问题对表层问题的规约机制及二者相互间的转化机制,以及各种深层问题之间的交互影响机制。掌握了这些,我们或许就可以更加全面地把握研究对象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形态,同时也能按照其内在的演化逻辑预测其接下来的发展趋势和可能性。显然这个层面的研究只靠材料搜集和感性体验是无法完成的,还需要从纷繁复杂的思想教育表象中挖掘出深层的决定因素,然后再将这些因素串联起来,最终获得对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现象的真正理解。

三、比较与互动: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范式

在明确了理论立场与问题界限之后,我们就需要回答“怎么研究”,这就涉及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的方法范式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言,方法研究“被视为跨文化研究中的学术焦点和难点。虽然自从人们意识到文化的多元性开始,就有了某种跨文化研究的雏形,但直到今天,跨文化方法的研究总体而言仍处于幼年期。”^[7]这一判断从某种意义上显示了方法问题在跨文化研究中的艰难程度。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跨文化研究的历史发展中获得有益启示。

跨文化研究在历史上大体有两种先后出现的范式:“(1)探讨不同文化中的同类现象,(2)研究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交流和互动。”^[8]从方法论角度,我们可以将之概括为“跨文化比较论”与“跨文化互动论”。比较论出现于早期跨文化研究之中,主要以跨文化人类学为代表,目的在于把握不同文化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重在以比较研究为基本方法,探讨不同文化中的同类现象及其内在必然性的因果联系。互动论大体出现于20世纪中后期,主要以全球史研究为代表,目的在于展现不同

文化间的交互影响,强调在比较方法的基础上引入对话哲学。两者各有利弊,比较论的长处在于可以通过对多个文化的大量的民族志资料的量化分析,揭示不同文化间的共同特性,而其问题在于如何克服以自我或他者为参照的理论立场。互动论的价值在于它变革了先前研究对文化的实质主义理解,即认为文化的边界与社会或国家的疆界相互重合,而文化就是特定地域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连续不断的一整套独特的文化样式的综合,转而强调文化的交互性影响及存在方式。所以它的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两个文化共同体之间的简单比较,而在于从地理环境、思想传播以及技术、人种和物种甚至疾病的跨区域流动等视角透视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它的问题在于拒斥对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寻求,从而有可能导致文化相对主义的立场。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都特别重视经验性的实证归纳和大样本的数据搜集,它们面临的共同难题是“因果关系与对等性”。“前者的困难在于如何排除混淆变量对推论结果的解释,后者的困难在于把握相同命题在不同文化中的意义指向”^[9]。

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这样一个新兴领域来说,我们显然应该充分发挥好自己的后发优势,站在整个跨文化研究的前沿,结合自身的理论立场和问题界限吸收借鉴跨文化比较论与跨文化互动论的优长,同时克服双方各自的弊端。具体来说,应着重注意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克服跨文化比较论的参照系选择弊端。首先应克服“他者参照”的弊端,尤其要警惕那种因“精神殖民和知性殖民”而产生的“文化无意识”的影响,将他者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当作样板来观照自己。近些年我们在研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中,有时过于强调他者的合理性,过于突出他者经验对我们的借鉴意义,其实或多或少的体现出以他者为参照。同时也应警惕“自我参照”的问题,应按照“以人度人”的理论立场从他者出发真实地理解和把握他者。二是克服跨文化互动论的相对主义弊端。诚然,无论是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长时段历史抑或是从世界文化交融、交锋、交汇的现实来看,纯而又纯的“民族文学”或“地方性知识”已难以存在,而且都需要在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发展自己。但交流双方在(下转第71页)

创新,这不仅能促进教师个人的发展,而且能保证团队的长远发展,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进而提升高校的竞争力。

2.明确教学科研理念,创造条件寻求发展。明确教学科研理念是团队组建的基础,上至团队的带头人,下至团队的成员,首先要有共同的目标理念,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团结一致,这样每个成员才会努力创造条件为团队的发展寻求机遇。反之,如果每个成员各怀心思,没有统一明确的团队理念,没有中心点,在团队的运行过程中,就会呈现出一盘散沙的局面,无法凝聚各方面力量,教学工作做不好,科研水平提不高,团队最终也得不到发展。

3.健全团队管理机制,促进全面发展。教学科研团队在开始组建时,就要有健全的管理机制,成员的加入要有选择标准。进入团队后,根据共同的教学科研理念,在实际操作环节,哪些是应该竭尽全力去做的,哪些是可以不用消耗精力的,都应该有具体的管理条例。同时,要不断完善和改革相应

的奖励机制、职称评聘机制、考核机制、学习机制等,通过切实可行的有效管理机制,解决思政课教师的后顾之忧,使其能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科研工作,不断创新思政课教育教学的理念、内容和形式,努力把思政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

参考文献:

- [1] 王小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建设的问题及原因探析[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0,(2).
- [2] 李庆霞.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团队建设的必要性及其原则[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9,(11).
- [3] 李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教学团队连接模式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9).
- [4] 刘贯宇,李华香.弱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创新团队建设探析[J].理论导报,2010,(2).
- [5] 郑洁,侯玲玲.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科研团队建设探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4,(9).

[责任编辑 赵静]

(上接第21页)同一文化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地位绝非等同,而是存在一个以谁为主和作用大小的问题。如果将跨文化互动论的方法范式极端化,就会对文化互动的过程作相对主义的处理,就可能否认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及殖民主义的历史非正当性。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美化或合理化侵略历史的虚无主义思潮就是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三是克服两者共同面临的“因果关系与对等性”难题。对此杨晓慧教授已有系统分析,在此不做赘述。本文只须指出两点:其一,在处理因果关系时因注意在深层问题中找寻表层问题的成因,在处理对等性问题时应注意不同文化间问题层次的对等性;其二,在运用跨文化互动论范式时,应突出物质交往特别是技术交往、经济交往在文化互动中的决定作用,不能过度夸大思想交往的价值,否则就可能步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后尘。

当然,方法论问题往往是科学研究中意义最大也难度最大的问题,它不仅需要理论的推演更需要长期研究实践的淬炼,其内涵之丰富、外延之广泛、结构之复杂,远非一篇文章或一部著作所能涵盖。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方兴未艾,其方法

论研究也将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 [1] 萨义德.东方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9:229.
- [2] 任志锋,郑永廷.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失衡现象及对策研究[J].教学与研究,2015,(1).
- [3] 巴赫金全集(第4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371.
- [4]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09.
- [5] 纳西夫.跨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J].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9,(6).
- [6] 卡尔·海因茨·波尔(卜松山).中西价值: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论反思[J].社会科学战线,2010,(11).
- [7] 前沿性问题和理论研究课题组.国际跨文化研究引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4).
- [8] 何平.跨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J].史学理论研究,2014,(4).
- [9] 杨晓慧.思想政治教育跨文化研究:内在规定、学术主题、方法范式[C].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设立30周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研究[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5:55.

[责任编辑 吴宁宁]